

《新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统治的第一刊

——兼与《新月》比较

郑大华,钟 雪

摘 要 1928 年创刊的《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它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刚刚建立尚未形成完善体系之际,就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包括对训政理论的批判、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批判、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建议等。杂志刊登的政论时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人权、争法治,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先声。其对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思想的追求和讨论为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但《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唯一合法性代表之地位为前提的,换言之,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种对国民党“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既是其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体现,也是其政治价值追求与现实政治冲突的体现,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与《新月》相比,《新路》能从各种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学理层面的辩驳、制度层面的剖析、现实层面的揭露,而《新月》更多的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诉求,有将政治问题简单化约为法治问题的倾向;《新路》处处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成效,而《新月》则更多地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批判现实政治。《新路》批判的言辞也比《新月》激烈得多。

关键词 《新路》《新月》张君勱 李璜 胡适 南京国民政府 近代报刊

中图分类号 G239.29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0)04-0077-14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民国思想家群体研究”

作者简介 :郑大华,湖南永顺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湖南省“芙蓉学者计划”首批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湖南长沙 410081);钟雪,湖南浏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方向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或研究著作都认为,自 1929 年第二卷起批评国民党践踏人权的《新月》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最早刊物。实际上,《新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要晚于《新路》整整一年,1928 年创刊的《新路》才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尽管它刊行的时间不长,内容却相当丰富:既有知识分子对国内各种政治主张或建国方案的评论,也有其本身的政治要求和社会改造方案;既有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批评与建议,也有对他国政治形势、政体政策的介绍和评价,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

后存在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

目前有关《新路》研究的专题论文、论著尚未出现,大多只在有关张君勱、李璜的研究中附带提及。造成学术界对《新路》缺乏研究的原因有二:一是杂志本身存在的时间不长,一共只出版 10 期,且为秘密发行,很多图书馆都没藏有该杂志,因而易为人们所忽视;二是受学术界对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的评价认识所限。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学术界因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反苏反共”主张,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其归为“资产阶级右派”,而《新路》创办者李璜是青年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另一创办者张

君劢是30年代初成立的国家社会党的党魁,由此将《新路》认定为反动性刊物、淡化其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色彩也就顺理成章了。有鉴于此,我们不揣冒昧,拟就《新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作一研究,并兼与稍后的《新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批判的异同作一比较,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新路》的创办、宗旨和作者

《新路》的创刊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中国政治形势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使国民党党政大权落入蒋介石手中,自此初步奠定了其实施专制独裁的基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宣称遵照孙中山遗训进行国家建设,以训政为名,实施一党独裁,并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允许异党或异己分子发表言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曾经追随甚至支持国民党叛变革命并将其政治理想寄希望于蒋介石集团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他们既害怕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同时又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感到不满,于是纷纷以各自的政治蓝图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

如果说以上是杂志创刊的客观环境,那么两个主要创刊人张君劢和李璜的巧遇以及相似的处境则是主观的个人因素。

1927年,张君劢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结识了以青年党代理主席的身份在上海主持青年党党务工作的李璜。据李璜回忆,两人合办刊物是缘于“精神上都无出路”。^①此时,青年党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的严厉打压,其重要领导人或被捕或逃亡,李璜受命去上海主持党务。据李回忆:“因同志劝告小心”,他只能“昼伏夜动”,“在这种独立撑持党务中,除与两秘书办理日

常事务外,我无可与谈者,正闷得发慌”,而此时的张君劢也因长期追随梁启超被国民党视为“进步党余孽”,其创办的国立政治大学被当局查办,精神上同样处于无所寄托、政治情感无以抒发的时候。张于是约李共同创办地下刊物,用“非法”手段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张的想法得到李璜响应。由张负责筹款和印刷,李璜则负责杂志的发行,文字以他们两人为主,此外各找同志作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28年初《新路》在上海秘密创刊,每期印3000份,除在租界内送阅外,全国各大书局设有分售点,还以特种邮寄的方式分别寄赠各地友人。

张君劢起草的《发刊辞》,提出杂志立言的四个标准是:一、持论务求平实;二、手段必加选择;三、立法期于久远;四、主张持以坚定。上述四个标准集中反映了《新路》论政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坚持和平改良的社会改造方案;二是坚持走民主宪政道路。“本此四义,而又外察大势,内审国情”,^②张君劢接着提出了12条具体的政治主张:一、主张民主政治,反对帝制及一阶级专政、一党专政;二、主张以自治精神谋统一,反对一切征服式之武力统一;三、主张军队应用于国防,反对军队供私人或党派内讧之用;四、主张确立文官保障制度,反对事务人员之任意进退及党化;五、主张实施预算与财政统一,反对无预算之浪费及横征苛敛;六、主张司法完全独立,反对司法之党化及军法裁判之滥用;七、主张言论结社等自由,反对以党治或军治之名义剥夺人权;八、主张教育在养成健全国民,反对教会教育及党化教育;九、主张开发生产,改进农工生活,反对阶级斗争及其他妨碍经济发达之运动;十、主张国家在国际间之独立与平等,反对外力侵略及一切卖国误国之举动;十一、主张昌明本国文化,发挥科学精神,反对漫无择别之守旧与生吞活剥之鹜新;十二、主张国家进步,应注重平和建设,反对只图破坏之革命。从杂志所刊载的文章来看,几乎都是以这12项政治主张为立论中心的。因此,这12项政治主张既可看作《新路》同人的政治宣言,也

①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香港:明报月社,1979年,第237页。

② 《发刊辞》《新路》第1卷第1号,第3页。

可看作杂志的办刊宗旨。

《新路》刊载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杂志作者自己撰写的政论时评。就内容上看，这些政论时评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国民党以党治国、专政独裁的批判；二、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在此指导下的共产革命的批判；三、对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批判及建议；四、对当时国内的各种政治学说、建国主张的批判。除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外，《新路》同人还对当时改组派陈公博的思想以及戴季陶主义进行了批判；五、论述和介绍西方（包括俄国）政治制度、政治形势，如“南公”的《评俄国委员会制》以及张君勱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之解剖》等。第二部分是翻译的外国论著。从内容上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五期，每期都刊登有梁实秋翻译的爱尔兰著名戏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和邓塞尼的戏剧作品，如《月之初升》、《一顶帽子》等。这些作品表面看来似乎与杂志的办刊宗旨无多大关联，但从其对作品有选择的翻译来看，实质上是借此表达他们对一党专制的厌恶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追求。后五期连载了由“南公”翻译的《瑞士公民军论》，以及“力人”翻译的《英国韦尔斯氏评墨索里尼》等。这些文章虽不是将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专制统治，但其借此批判国民党专制独裁，告诫国民党改弦更张的意图极为明显。

李璜和张君勱既是杂志的创刊人，也是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他们每人每期为杂志写一篇文章，偶尔外加一篇短文。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用的都是笔名，张君勱多署“立斋”，李璜多署“春木”。除张君勱和李璜外，为杂志撰稿的还有23人，因杂志批评时政的特殊性，所有文章署的都是笔名，可考真实姓名和身份的作者虽然只有梁实秋、诸青来、潘光旦等几位，但根据杂志刊载的文章内容和对可考作者的思想历程、教育背景的分析，《新路》的作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就其教育背景来看，大多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综

合起来，他们对西学的了解，涵盖了政治法律、遗传生物、文学戏剧等各个领域，这为他们从不同角度运用各种理论学说来分析中国问题、思考民族命运和出路提供了便利，如潘光旦留学期间专攻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广泛涉猎西学关于心理学、遗传学、人种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各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因此他从优生学的角度来权衡民主政治与阶级政治孰优孰劣。梁实秋精通外国文学，翻译了数篇爱尔兰著名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邓塞尼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或是隐晦地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或是充满爱国主义情感。其次，就其政治倾向来看，尽管有的不是青年党党员，但都深浅有别、程度不同地有国家主义倾向，如张君勱虽然以青年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为由，拒绝了李璜希望他加入青年党的邀请，但从其主张政治上走民主宪政、经济上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来看，与李璜在《谈谈我们》中阐述的中国青年党的政纲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第一是全民政治，第二是社会政策，前者所要求的是有轨道的近今的民主立宪政体，所谓法治主义是也，后者所要求的是在民主宪政之下，干涉经济组织，以解决社会问题，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是也。”^①他们大都奉行“国家至上”，反对国际主义、反对阶级对立的社会形式，而提倡一种温和的社会改良方案。

《新路》对国民党当局内政外交政策的激烈批判，必然引起当局的反应与镇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28年2月29日通过《反革命治罪条例》，送经国民政府于3月9日公布，改为《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共计13条，其中第6条规定：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者，处2年至4年有期徒刑。其适用范围甚广，又无明确解释，易于罗织，人人于罪。此条文虽非专指《新路》，但《新路》绝难幸免。出版到第2期后，即遭上海特别市政府以“言论反动，主张乖谬，意在危害党国，破坏革命”的名义查禁；上海市政府、上海交涉署、淞沪卫戍司令部、知照租界工部局，查禁该发行所，并转令各书店，一律停止发售。查禁令下达后，张君勱、李璜并未停刊，相反在

① 李璜《谈谈我们》，转引自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第4期上发表张君劢以“君房”为笔名写的《新路禁止发行令书后》一文,对国民党罗织的罪状逐一进行批驳。尽管张君劢和李璜决心将《新路》办下去,但因为国民党查禁甚严,杂志既不易寄出,印刷厂也不敢承印,于是出版到第10期,他们便不得不将《新路》停刊。

二、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

(一)对训政理论的批判

1928年6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今全国统一,训政开始”。这年的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72次会议通过了《训政纲领》,从而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训政的政治体制基本框架,并将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中的政权和治权都集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手中,“训政”完全背离了孙中山以“还政于民”为归趋的民主精神。因此,对于不满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新路》同人来说,批判训政理论就成了他们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人民程度不高,不经过国民党的训政,不能运用民主政治,这是国民党人主张训政的一个主要理由。但在《新路》同人看来,训政与人民政治能力的培养毫无牵涉,人民运用政治的能力只能在民主政治的真正训练中有所长进。“力人”分析了三点理由:一是“真正国民的政治能力”是要养成他关于国家政策上的独立判断。他将之比喻为小孩子读书和学艺,假使让别人代替,知识怎么能得到提高,手艺又如何学到手呢?也就是说,以国民党来代替人民行使集会、结社、参政等权力于人们政治能力的培养是毫无益处的。二是政治能力的增加同责任心相联系。在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下,一切权力都交给国民党,人民毫无言论自由,根本就无所谓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最后,他认为国民政治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能议事,能组织政府,人民政治能力总算完备。他还指明人民行使政治能力需要三个条件:安居乐业、言论结社自由、健全的教育。但在国民党的专

制统治下,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所谓“还政于民”根本就不可能在国民党的手中办到。^①张君劢主要援引西方民主宪政实施的成功经验,论证“人民之愚,或法制习惯之有无,俱不足为讨论中国是否合于民主政治之根据”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国民党没有训政的能力和资格,因为使训的国民党和被训的普通民众“同为国民,年龄相等,智识相类,乃以一为革命党,一为非革命党,而分成训人与训于人之两级,靡论其智识之不足以语此”。^②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人民运用立宪政治的能力只有在立宪政治下通过选举、组阁等民主实践才能得到提高,这和西谚的“学游泳者,应自入水中始”是同一道理。他还借用杜威的话说:“宪政之全部,生活也,长成也,其国民在宪政实地试行之中,则政治能力自有进步,反是者,永不试行,永不错误,则永无进步。”^③因此,与其空言教人选举,不如使人直接行使选举权;与其空言议会之议事,不如令人民直接参加议会,积以岁月,人民之政治能力自可养成。

国民党主张训政的另一理由,是认为民国以来的民主政治试验都以失败告终,因此必须通过训政再过渡到宪政。但在《新路》同人看来,此种理由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因为民主政治在中国就没有真正实施过。民主政治之所以在中国不能真正实施,是因为选民资格“无正确之表明”,选举舞弊“无监督之防止”;政党之组阁内政无元首之推诚相待,予以充分之自由”。^④而产生上述现象的根源是军阀横行,政客拨弄是非,毁法乱纪。这些事实恰恰证明中国有结束训政、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新路》同人在对训政的原因和借口进行批驳的同时,还对训政的具体内涵主要是县自治思想进行了批驳。孙中山希望由国民党训练人民实现县自治,多数省份实现县自治后再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他还在《建国大纲》中提出了县自治应该达到的四个

① 力人《百孔千疮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新路》第1卷第8号,第15页、10页。

② 立斋(张君劢)《辟训政说》《新路》第1卷第7号,第5页。

③ 立斋(张君劢)《辟训政说》《新路》第1卷第7号,第9页。

④ 《发刊辞》《新路》第1卷第1号,第4页。

标准,即全县土地测量完成,全县警备办理完成,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国民得四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之训练,其实质就是通过“官治”以实现“民治”。“无闷”认为孙中山把这四项作为达到自治的标准是“本末倒置”,因为人民自治能力的养成,要靠创造心和自动力。如果中央只是颁布若干条概括的规定,而于具体的政策,则因地制宜,酌量办理;官吏不加掣肘,而事务迅速进行”,^①那么户口、土地等各项就能彻底调查整理。也就是说,只有放弃“官治”,实行自治,才能达到孙中山所说的几项标准。张君勱认为宪政是全国的事,选举权为全国人民所共享,不必与各县各省的自治挂钩。他还援引美国、日本、英国的宪政都不以省县而以全国为起点同样能“大奏成效”的事实来论述自己的观点。^②他指出,英国1832年选举改革时,也“无此四者之完善行政”美国独立之初,同样“筚路蓝缕亦无余力及于路警”,但这些都不妨碍宪政的实施。^③而且土地测量、道路修筑和警察完善等根本就不能代表国民的自治程度,这三者是行政方面的问题,宪政是政治方面的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他强调,只有施行宪政自治,四项标准才能完成,人民“四权”的训练,也只有在立宪政治之下才能得以实现。

(二)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批判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仍然忙于武力统一全国,因此其组织体系基本沿袭的是广州与武汉政府时期的政府组织形式。1928年10月,随着北伐完成,国民党开始将政府组织的建设提上日程。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72次会议通过的《训政纲领》,确定了训政的政治体制基本框架,随后又据此起草并公布了《国民政府组织法》。概而言之,《国民政府组织法》有三个特点:第一,确立了国民党在政治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第二,虽

然规定五权分立,实际上只是党中央领导统辖下的五权分立;第三,整个政府组织的建构只是国民党内部争夺权力的产物。对此《新路》同人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批判:

第一,国民党一政府这种二元政治体制造成机构叠床架屋,职能重复、冲突,权责不明。他们认为国民政府所实行的六级制(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五院—各部)“一方以党的关系,就不能不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政治会议,同时关于国家政府,又不能不设各部各院及国民政府机关”,^④其结果是权责不明,除了五院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在条文中明确规定外,“所谓政治会议之指导监督权”和“中央会议之指导监督权”在于何处“不得而知”。至于党中央领导下的五院也根本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尽管表面上有“最高行政权”、“最高立法权”等字样,但实质上“五院之法律命令,须经国民政府国务会议而决定”,^⑤这样它们不过是党中央领导下的执行机关而已。“达人”还特别就立法院的权能职责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剖析。他首先对比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关于五院都能“依据法律发布命令”的规定是极为荒谬的。接着,他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对立法院的权责问题提出了几点质疑:(1)中国没有宪法,因此无所谓“立法权与命令权之界限”,这样一来立法院的权限就得不到有效保障。(2)由于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是“每月收入,不敷四五百万,专恃借债度日”,所以预算案永无提出之日,立法院所谓的“议决预算案”的监督财政权只是一纸空文而已。(3)目前各省各自为政,南京所议之法案不一定能推之全国。(4)万一南京政府因战事征兵筹饷,立法院能不能干涉也是个问题。^⑥

第二,《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官职达朋分之目的”,是政府官员的“分赃之具”。《新路》

① 无闷《建国大纲质疑》《新路》第1卷第8号,第39页。

② 立斋(张君勱)《辟训政说》《新路》第1卷第7号,第7页。

③ 立斋(张君勱)《辟训政说》《新路》第1卷第7号,第8页。

④ 力人《百孔千疮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新路》第1卷第8号,第12页。

⑤ 达人《自法制上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新路》第1卷第8号,第1页。

⑥ 达人《自法制上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新路》第1卷第8号,第5~6页。

同人通过对政府官员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的剖析得出此种结论。“力人”意识到在六级中居要职的不过是蒋介石、胡汉民等这帮国民党的“大佬”，他认为这样的机构设置不过是“三数人之朝三暮四之技”。^①对于国民政府设置16人委员，其下又有各部部长10人；“达人”认为假使“以十六人之委员为人才用之”，^②就完全应该也可以让他们兼任各部部长，这样能避免官员冗繁，减少“彼此的倾轧”；相反，如果不是人才，更没有必要占有政府委员的虚名，坐食俸禄。

应该说《新路》同人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上述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们以自己所熟悉的西方法学知识为参照，对训政体制的职能权限、机构设置、官职人员的安排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甚至对个别的文字疏忽之处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质疑，从国民党政治制度的组织层面揭露其以训政为名行专制之实的险恶用心，进而从法律依据上否认了独裁政府体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们认为《国民政府组织法》不过是国民党内争权夺利的工具，因为在一党独裁的统治下，是权力左右制度，而非制度制约权力。《新路》同人的上述认识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国民政府组织法》是根据胡汉民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所提《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拟成的，胡汉民用意是要借孙中山的五权学说，来确保自己的权力，同时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蒋介石的权力加以限制。当时的陈公博就评价说：胡汉民的方案是“借名实行建国大纲，而对于大纲所规定的条件，倒不注意它是否成立。胡先生所要的仅是立法院，而把国府主席让之蒋先生”。^③因为根据他提出的《国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国府主席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已。当然，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后来多次根据个人意愿修改政府组织法，变更政府相关职能，自己当行政院长时，行政院长的权力最大，自己当国民政府主席时，国民政府主席

的权力无人可比。因人立法、修法，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的一大特色。

在批评五院制的同时《新路》同人也对委员会制提出了批评。所谓委员会制，又称合议制，是指行政组织决策和管理权由若干人组成的委员会共同行使，按少数服从多数协商一致的原则集体决定、共同负责的组织体制。实行委员会制的国家，其最高权力是由一个委员会而非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履行。在世界各国中，瑞士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代表。这种制度的意义在于防范行政的专制，以众人的合议，使行政机关侵犯议会或危害人民自由的种种行为较难实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也采用合议制的行政组织。首先《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设主席委员1人、委员12至16人，国民政府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接见外使，并举行或参与国际典礼，其权力、地位“与其他常务委员同”，^④其次，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委员任之，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再次，国民政府是中执会的执行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议案必须执行。但规定归规定，在实际运作中南京国民政府却背离了合议制精神，实行的是“委员制式的专制”政治，^⑤“委员地位职责似极平等，然主席毕竟有掌握全局之权，而日常行政问题，悉取决之，顾主席于无形之中远驾委员之上”。^⑥“南公”通过对瑞士、苏俄和国民党实施的委员会制的比较，认为苏俄和中国属于同一类型，而瑞士则另属一类。后者具有“合议制之真精神”，总统的职权除对内为委员之主席、对外代表委员会履行各种仪节外，与其他委员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其联邦行政委员会不为一党所独占，委员会超于党派之上。而中国的委员会制却完全相反，首先，一党把持国政，无合议精神之实质；其次，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国府委员兼掌全国立法行政事宜，不像瑞士一样有立法和行政之明确分工，第

① 力人《百孔千疮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新路》第1卷第8号，第12页。

② 达人《自法制上批评国民政府组织法》《新路》第1卷第8号，第5页。

③ 陈公博《苦笑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④ 《训政大纲说明书》《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87页。

⑤ E. S. Corwin《中国无权宪法之评论》《东方杂志》第26卷第1号，1929年1月10日。

⑥ 转引自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三、国民政府及政治会议依据国民党的党义党纲设置，而瑞士行政院之成立的依据是国宪。^①

（三）对一党专制制度的批判

在批判国民党借以维护其专制统治的训政理论和政府组织法的同时，《新路》同仁也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制度本身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缘于对一党专制制度本身的否定，另一方面也缘于对国民党执政效果的现实观感。在《新路》同仁眼中，国民党执政后的社会与北洋政府时期相比并没有丝毫的进步和改善可言，“军阀之跋扈，共匪之纵横，财政之紊乱，教育之破产，贿赂之公行，奢靡之成习，较诸昔之军阀有过之，此皆党内党外之公言”。^②而这些显示出的是现行的一党专制制度的种种危害和弊端。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党外无党“使得”党内有派，引起党的纠纷和内讧。《新路》同仁认为，蒋介石国民党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不同政见的人另外组党本来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党内纠纷可以通过另组政党得到解决。但国民党主张“党外无党”，不允许异党的存在，屠杀异党人的身体，干涉异党人的自由，束缚异党人所持的意见，这样不同意见的党人只能在党内你争我夺，引起党的纠纷和内讧。从国民党的立场考虑，当然“全国的政权握于一党，法令出于一途”，是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但从常理出发，“拂逆任性，违反国情，远于事实，背叛世界的潮流”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必使“国民党同归于尽”。^③

（2）一党专制容易引起武力纷争和循环革命，导致国家分裂。他们认为，一方面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广土众民、历史和文化悠久博大的国家，又处于国内国际关系复杂的环境当中，因此不同社会解决方案的提出本来是不得已也是必要的，但国民党非得实施一党专制；“强天下以从我”，^④这就使得原本能够合法表达政治意见

的异党不得不以阴谋和武力相尚，导致国家不能统一；另一方面，国民党实施一党专制很容易使得那些反对国民党的党派通过某种程度的协调团结起来，结成一种联合战线，将国民党作为唯一的革命对象，原本是“政见的争持”转而成永无止境的“意气仇杀”。^⑤

（3）一党专制无法理上的依据，易造成政治上的腐败之风，得不到真正的治国之才。对于一党专制下以党籍和尊崇三民主义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的做法，《新路》同仁是大加讨伐。张君勱指出，三民主义就如同“昔之圣谕广训”，以入党资格招徕之就如同“昔日之科举制”，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和“革命者”的美名，使得持“攀龙附凤”之心理的人们作出“奴颜婢膝”之行动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⑥不经过考试选拔和练习的文官随时可以更动，且以入党为猎官之途，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根本得不到真正的人才。“纯士”也认为一党专制容易导致政治上的投机攀附之风。本来国人对于国民党的赞成与否应该“诉之于个人的见解和良心”，但一党专制之下，以饭碗（即高官厚禄）和武力（即以“反革命”论处）实行利诱威迫，使得过去曾经效力于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为能保住饭碗、为避免自己的人身安全不因“反革命”的罪名受到威胁，转而就投身国民党的名下，像这样一帮丧失志节的无耻官员要希望他们认识主义、推行政策，指望他们握有实权后不以党营私，面对环境变化而能“效死勿去”是完全不可能的。^⑦李璜还从思想自由的角度对一党专制进行批判，认为国民党压制思想自由，容易导致社会解体。他从两方面来论证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一方面，思想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也是人的“本身价值”，压制思想自由也就是对人“本身价值”的否定；另一方面，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产生是以人的

① 南公《评委员会制》《新路》第1卷第6号，第34页。

② 立斋（张君勱）《新路禁止发行令书后》第1卷第4号，第2页。

③ 纯士《为国民党讨论一党专政之利害》《新路》第1卷第2号，第38页。

④ 纯士《为国民党讨论一党专政之利害》《新路》第1卷第2号，第37页。

⑤ 纯士《为国民党讨论一党专政之利害》《新路》第1卷第2号，第38页。

⑥ 立斋（张君勱）《现实政潮中国民努力方向》《新路》第1卷第3号，第5页。

⑦ 纯士《为国民党讨论一党专政之利害》《新路》第1卷第2号，第40页。

需要为前提的,如果社会只有“奴役与屈服”,则极容易导致社会解体。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进步太少就是因为专制社会中思想自由太少,近代好不容易有了些“自由批判”的生机,国民党执政后却极力摧残,这显然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①

除从一党专制给现实政治带来的种种危害处着眼批判一党专制外,还有人从中国的现实条件出发否认了一党专制在中国实施的可能。如“秋水”就从考察国民党自身能力的角度出发,认为一党专制的理论与民主主义不相容,在事实上也绝对办不到,因为“一个政党就算再圆满也只能尽他特殊的相当能事,不能望他万能”,^②国民党不过是少数人的集合;“权可高而力终不能大”。^③他甚至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蒋介石,认为蒋的心术与权欲集袁世凯、徐世昌和曹锟三人之长;“以利禄奔走小人”;“以威力变更定律”,^④使党德和党纪破坏无余,这样的党早就没有任何生气,党权在实质上也不存在,因此现在的国民党“既不敢专制干预,且恐怕一旦爆裂,妥协敷衍,只有专政之名,而并无专政之实”。^⑤与“秋水”不同,“申隐岩”则从分析独裁政治形成的原因着眼,得出一党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他认为独裁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发生的主客观条件。就客观条件看,它是非常态社会的产物,中国之所以实施独裁是因为内有军阀捣乱,外是帝国主义侵略日甚。他将独裁政治比作“毒药”,病态严重时,毒药会有很大副作用,但“足以救死扶伤”;“若令健全之人服其毒药,反致命伤”,^⑥而中国的现状还够不上“病态严重”。作者认为独裁政治的主观条件就是“强有力之奸雄”。既然是奸雄政治,则“人存则其政举,人亡则其政息”。他分析苏俄以及意大利的一党专制的发展历程,认为列宁在位时政权巩固,死后出现

了民主化和内讧不止的两种变化;而对于墨索里尼的独裁政治,他则引用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通讯”中的一个比喻,认为一般资产阶级拥护党治只不过“如房屋着火之时欢迎救火队,火灭灾除后,并不愿救火队永久包围吾辈之住宅”。^⑦就此而言,国民党实行一党专制只能是自取灭亡而已。

(四)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批评与建议

《新路》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不断激化的历史背景下创刊的,其同人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进行批评的同时,也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国民党统治初期的重要外交活动和重大外交事件给予了极大关注和理性的思考,表达了其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要求。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定都宣言中提出“惟有秉承总理全部遗教……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同享民治民享之幸福”。^⑧自此,废除不平等条约、缔结平等新约就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目标。但由于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国内统一没有足够力量与列强从事对等的外交折冲,另一方面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废约照会不予理睬,因此此时的废约并没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直到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尤其是王正廷继任外交部部长后,才开始其“革命外交”,先后照会美、德等国,开始了改订新约运动。到1928年底,先后与挪威、荷兰、英国、瑞典等12国签订了新的条约。关于改订新约,《新路》同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不仅对孙中山的废约主张提出了质疑,也对政府改订新约外交的实际成效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第一,对孙中山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

① 春木(李璜)《从思想自由到政治自由》《新路》第1卷第2号,第53页。

② 秋水《评陈公博论今后的国民党》《新路》第1卷第6号,第12页。

③ 秋水《训政回头》《新路》第1卷第10号,第12页。

④ 秋水《训政回头》《新路》第1卷第10号,第12页。

⑤ 秋水《评陈公博论今后的国民党》《新路》第1卷第6号,第12页。

⑥ 申隐岩《独裁政治之批判》《新路》第1卷第10号,第29页。

⑦ 申隐岩《独裁政治之批判》《新路》第1卷第10号,第30页。

⑧ 郭以廷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第740页。

交思想提出了批评。“力人”认为孙中山的外交方针是学习苏俄的那套，但苏俄所废除的条约都是“侵略所得”“损人利己”之条约，所以苏俄单方面宣布废除条约，对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中国所要废除的是他国压迫我国的条约，因此废除绝非易事。张君勱也认为俄国所废除的都是“利俄害人之约”，因此即使废除也没有什么抗议者，这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要使国家收回利权必须内政修明，绝不是走单喊废除口号的“终南捷径”能办得到的。^①“宏敷”从阐述“理想”和“办法”关系的角度发表了自己对“修约”的看法，他认为“修改一切不平等条约，回复国权，并且我们中国可在国际公道上作一个砥柱，以维持世界和平”是“高的想象”，但就现状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中国收回汉口租借地，英国让步，这并不表明英国不敢较量，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丝毫没有提高，不过是“中风狂走”之醉汉的行为。^②因此，他认为“低的办法”就是一方面要极力整理内政，另一方面以一种渐进的、光明正大的态度来争得国家地位。“无闷”从对西方收回利权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中国收回利权的现实环境的考虑出发，对中国能否立即取消、废除不平等条约持有怀疑，他认为取消条约在欧洲国家虽有先例，但“能否收效，亦视本国势力及周围情势若何”，而中国现在四分五裂，即使能团结一致对外，政府竭尽全力，国民全体同为声援，“能否完全成功尚不在知之数”。^③“力人”还辨析了“废除”（abolish）与“修改”（revise）两个词的不同内涵，认为前者“即以单方面之行为，废之除之”，后者是指“以双方之同意行之”，他批评国民党的“修改”与孙中山的“废除”是相违背的；所谓修约，即变相的屈服于帝国主义，不特与中山先生打到帝国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主张相背驰，更非国民政府，革命政府所应出”。^④

第二，就改订新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剖析评价。对于关税自主问题，“力人”批评国民政府所争的“关税自主”，在本质上只是与外国协商税率的高低，又揭露其之所以如此迁就妥协，目的只是为了“早得一二千万之新收入”，从经济上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自己的权力，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发展本国工商业。他还具体分析日本和德国在关税问题上与中国所进行的交涉，指出中德新约的签订实际上相对于欧战后签署的条约是一种倒退，因为德国在欧战后和中国重订条约已经承认我国有自主定关税的权利，本来完全可以“本此条文，为实行保护政策之发端”，但新约却以“最惠国待遇”取代之，结果这个所谓“最惠国待遇”也“仅指不得超过本国人民之纳税言之，绝不含与他国同等待遇之意”。^⑤而对于日本，“力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改订新约的失败直接导致“一场忙碌之条约改订，尽付东流”，因为尽管1928年底，中国与众多的西方列强重新改订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是重订《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但是由于条约中“此缔约国在本国领土内不得有任何借口向彼缔约国人民所运输进出口之货物征收高于或异于本国人民或任何他国人所完纳之关税，内地税或任何税款”的规定，^⑥即最惠国条款，因此，只要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其他国家就能以“最惠国条款”相难。

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力人”也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他指出改订新约中，英法美三个大国都未就领事裁判权问题达成共识，而与小国进行的交涉尽管取得了进展，但都是有条件的。他特别分析了中国与西班牙两国外交换文中以及新约中有关领事裁判权废除问题的条款，认为这些条款粗看起来“似甚痛快，若已允受我法权之管辖者”，但事实上却是两个条件束缚的：第一，有关领事裁判权的废除

① 《发刊辞》《新路》第1卷第1号，第15页。

② 宏敷《高的想象与低的办法》《新路》第1卷第9号，第22页。

③ 无闷《建国大纲质疑》《新路》第1卷第5号，第34页。

④ 力人《中山所谆嘱之废除不平等条约竟如何》《新路》第1卷第9号，第2页。

⑤ 力人《中山所谆嘱之废除不平等条约竟如何》《新路》第1卷第9号，第8页。

⑥ 力人《中山所谆嘱之废除不平等条约竟如何》《新路》第1卷第9号，第9页。

条款到民国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才发生效力,中国需在此期限内订定关于行使法权之详细办法。第二,在中国没有订此办法前,西班牙要等到华盛顿条约国同意废除领事裁判权之后才承认受中国法律之管辖。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司法制度不改良,华盛顿各协约国不签字承认,领事裁判权就永无废除之日,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兑现的空洞口号。^①“力人”还强烈谴责了国民政府在中日废约交涉过程中的妥协行为。他指出,政府在与日谈判中作出可以考虑用关税收入的500万元作为借款担保的让步案,这与其对外政策第六项“维持军阀地位之外债,中国人民不负偿还责任”的宣言是自相矛盾的,这一让步在东京某杂志上早就已经刊登,而国民政府却还作出“尚未承认西原借款”的掩耳盗铃之声明,这不过是愚弄民众而已。

《新路》作者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考察,指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以争得国家完全独立自主的艰巨性,并且通过剖析修订的既有条约,一方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达到利益均沾之目的野心,另一方面批评了国民政府与西方列强在废除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等问题的交涉中所作的妥协与退让。他们对改订新约过程中因帝国主义野心及国民政府出于自身权益的考虑而造成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他们对国民政府改订新约的真实动机的揭露也是一针见血的,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的确处于财政亏空严重的特殊时期,而一些与蒋不合的地方实力派早已表现出要单独与外国交涉关税的迹象,因此取得关税控制权的确是蒋介石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与维护自身权力、防止地方势力坐大的一大策略。尽管如此,因其批评时政的立场使得《新路》作者又没能对改订新约在争得国家主权独立方面的积极意义给予肯定的评价,这有失公允。诚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性以及内忧外患等多重因素,使得改订新约运动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改订新约”的确是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废除了列强的部分在华特权,为维

护中国主权作出了贡献,南京国民政府在关税自主方面取得的一定进展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说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新路》同人主要是批评的话,那么,对于发生于1928年5月的济南事件(即“济南惨案”)《新路》同人提出的则主要是建议。事件一发生,《新路》即在第1卷第5号上刊登《本报同仁对于济南事件发生后时局之主张》:一、督促负责当局,要求日本即时撤兵、赔偿中国军民被害者之损失并向中国人民道歉,不能贯彻此项主张者即认为卖国媚外之政府,全体国民共起声讨之;二、认定济南事件为国民党历来谬误的外交所招致之结果,国民责成国民党政府,戴罪图功,在对外交涉期间仍一致为之后盾;三、在全国一致对外期间,为集中全国人民力量期间,国民党应立即取消一党专政,与国人协力同心,共御外侮。这三项主张反映了民族危机下《新路》同人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硬态度和对国民党谬误外交的强烈指责。在国家处在亡国灭种之时,他们把民族救亡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现民主政治结合起来,并将之作为争得民族独立的有效条件,体现了民族民主双重意识觉醒下的理性思考。

这期(第1卷第5号)的《新路》杂志还刊登了张君勱以“立斋”笔名写的《济南事件与今后救国大计》一文。他批驳了日本政府为侵略寻找的各种卑劣借口,揭露了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巨大野心,并追究国民党之责任,提出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他认为日本借此事件想达到四重目的:一、使山东问题回到华盛顿会议之前;二、扩张自己的经济势力;三、借山东达到巩固其在中国东北部的势力;四、支持张作霖,维持中国的分裂状态。尽管济南事件的直接责任在日本,但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失误也是“今日事变之媒介”。他因而对国民党的对外方针政策以及训练兵士的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救国方针”,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曰对日方针,一曰立国方针。”就“对日”而言,张君勱主张,第一,调查

① 力人《中山所谆嘱之废除不平等条约竟如何》《新路》第1卷第9号,第7页。

启衅真相,以明责任之所归。第二,要求日本即时撤兵,赔偿我国军民之损失;日本应就对我国主权以种种侮辱向我国全体人民道歉。第三,准备武力与日人一战。他认为,要与日人一战,南北双方就应停止内战,而一致对外。就立国方针而言,第一是整顿国防与外人一战,第二是“团结民意,一致对外”。他指出,国家经此巨创深痛之后,当知国事之艰,非一党一派所得包揽,故国民党应放弃一党专制,而代之以“集中全国人才,成立国防政府”,同时为“实行民主政治”和“制定国法”做好充分准备。

三、与《新月》之比较

1927年春,大批从北京南下的“新月社”成员相聚上海,其骨干胡适、徐志摩等人筹办新月书店,并于1928年3月创办《新月》杂志。《新月》开始只是一个偏重文艺的综合性刊物,但从1929年第2卷起却大谈特谈起政治来,先后发表了一些批判国民党的政论性文章,发起所谓“人权运动”,成了部分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主要舆论阵地。1931年5月3日,上海《民报》发表汪常有的文章认为:中国目前有三种思想鼎足而立,一是共产党,二是《新月》派,三是三民主义。《新月》在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新路》创刊与《新月》谈政治的时间相隔正好一年,两者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下部分知识分子批评时政的刊物,因而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其作者群而言,第一,两份杂志编辑与撰稿人的构成具有明显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一方面反映在他们的职业状况和教育背景中,两份杂志作者群的主要代表人都具有海外留学的经历,得到西学的系统训练,都在国内高等教育机构或其他文化事业单位供职,大多具有社会活动家和大学教授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反映在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当中。当时,聚居在上海的有着留学欧美经历并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知识分子之间大多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社会认识及其政治理想方面的相似又

使得他们彼此欣赏。李璜曾回忆与“新月派胡适之诸人曾经往还,甚为投契”,^①他是1928年夏末在张禹九(张君勱的弟弟)家的一次宴会上认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知识分子的,这些新月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后来都被李璜聘为青年党干部训练学校——知行学院的教授,且“不要钟点费,而且自贴车费,从不缺课”,可见其“甚为投契”之程度。李璜也受邀参加过“新月派”的三四次聚会,胡适还曾邀请他为《新月》撰稿,但李璜考虑到自己有“异党该死”的罪名,文章发表出来后会影射《新月》的埠外发行而没有答应,^②最后经胡适的再三请求才写了一篇与政治无关的介绍法国历史学方法的文章。胡适还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他与罗隆基去李璜家的一次历时达7小时之久的长谈,并提到“幼椿先生态度很好,我们谈话很公开、很爽快”。^③张君勱与新月知识分子的相识要早于李璜,其与新月知识分子的交往主要基于两重关系,张君勱为徐志摩的妻舅(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的二哥),也是张禹九的哥哥,而张禹九、徐志摩两人都是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两人也都是新月书店的经理人。胡适的日记曾记载了张君勱参加“平社”聚餐,并从国际的角度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张君勱的《苏俄评论》就是由新月社出版的,《新月》创刊号还刊登有《苏俄评论》的广告。就此而言,尽管张君勱与新月派知识分子(尤指胡适)在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政治主张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他们能彼此欣赏,尤其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他们过往甚密的政治前提。张君勱与罗隆基的友谊也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建立的。自此之后,两人成了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的盟友,政治往来非常密切,30年代初,还共同创办《再生》杂志,筹组国家社会主义党。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知识分子中有些人还同时是两份杂志的撰稿人。如梁实秋曾以“慎吾”、“谐庭”的笔名在《新路》前5期连续发表了数篇译著,这几篇译

①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244页。

②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238页。

③ 《胡适日记》,1929年6月18日《胡适全集》第3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3页。

文都是表达爱国主义情感或对民主自由追求的爱尔兰戏剧,到《新月》刊行时期,他更是成了批判国民党践踏人权的主要作者之一。潘光旦在《新路》上发表批判为独裁辩护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又在《新月》上发表从优生学探讨中国问题的文章。第二,从思想感情和政治主张上看,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有着相似的思想主张。(1)都以西方的民主自由式政治为理想追求,西方的宪政、人权、民主、自由成为其考察国内社会状况、政治状况的角度、出发点和重心。(2)都对国家主义有着深浅不同的赞同,李璜是国家主义党派青年党的党魁自不必说,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一起组织成立了“大江会”,这是一个由部分留美学生组成的国家主义组织,其宗旨“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①梁实秋在《新路》发表的译文《文学里的爱国精神》就曾在大江会的《大江季刊》上刊登过。因此,反对世界大同和国际主义,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反对任何阶级斗争和一党专政是这批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再加上处在共同的社会环境下,面临同样的社会政治问题,因此,他们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国民党,都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都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求实现宪政、保障人权,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主张通过渐进的改良手段来改造社会、改良政治。尽管这两个刊物的共同点都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和对民主思想的宣传,但就其批判的内容及其锋芒和宣传的重点来看,又存在一定的差别:

第一,两份杂志的“主张”和“反对”都是双管齐下,但《新路》是以“反对”为重心的“主张”,而《新月》则是以“主张”为重心的“反对”。一方面,就民主政治思想的学理探究上来看,前者不及后者,《新路》作者也对法治、人权等民主政治有所论及,如在《发刊辞》的12项政治主张中就有“反对以党治或军治之名义剥夺人权”;“主张司法完全独立”的内容,^②但却没有像罗隆基等

人那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另一方面,《新月》政论文章的作者只有胡适、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数人而已,但《新路》的作者则有23人之多,作者不同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使《新路》能从社会学、生物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各个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进行学理层面的辩驳、制度层面的剖析、现实层面的揭露,而《新月》更多的是对法治和人权的诉求,有将政治问题简单化约为法治问题的倾向。与《新路》的“全面出击”不同,《新月》对国民党的批判是“重点突破”式的,他们借助人权和法治这两面旗帜批评国民党政治,也就不能收《新路》“釜底抽薪”式的效果。

第二,尽管两份杂志的成员构成有一定的同质性(上文已有分析),具体到撰稿人个体,由于党派身份、性格品质等的差异,两者的批判角度和程度也存在差别。先就批判角度来看,《新路》作者大多都是国家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很多还是青年党员,“国家至上”的信仰使之处处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成效,而《新月》的作者则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很深,他们更多的是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角度来批判现实政治,批判国民党对人权的践踏,而很少论及国民党专制独裁给国家统一带来的危害,他们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止于内政而很少涉及外交,而这些又恰恰是《新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之批判的特色所在。再就批判的力度和程度而言,因撰稿人本身思想的差异,《新月》刊载的政论在措辞上显然要比《新路》缓和得多。我们可以将胡适和李璜做一比较(两人分别为两份杂志的创刊人和重要撰稿人,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国家主义提出的“打倒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口号,胡适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多党政治是多党共存,虽然反对,而不相仇视。若甲党以‘打到乙党’为标准,则不能期望乙党之承认其共存”。这说明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要比李璜温和得多。可以这么说,李璜青年党的身份使党派利益成为影响其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是

① 转引自刘炎《潇洒才子梁实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② 《发刊辞》《新路》第1卷第1号,第3页。

无党派人士胡适所没有的。中心人物的思想必然会对整个杂志产生影响。《新路》在训政还没开始真正实施时就根本否认其必要性,而《新月》却在承认训政的前提下(尽管这种承认也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姑且承认”)要求颁布约法来规范政府权力。《新路》在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同时,还追根溯源地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革命程序论等思想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新月》除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外再也找不到批判孙中山学说的文字。相反,罗隆基在论证思想言论的重要性时还引用了孙中山关于自由的学说。《新路》明确指出专制独裁在中国行不通。《新月》作者虽然也持同样的想法,但在措辞上仍然是在承认和维护国民党专制独裁制度的前提下批评现实的执政效果。尽管张君勱辩称他们创办《新路》的目的只是为了“切磋政治”,^①胡适也声明他们谈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②但事实上,与《新月》比较,《新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不仅要早一年之久,而且其批判的言辞也要激烈得多。

四、结 语

《新路》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批判,必然会受到国民党的镇压。因此,它只出了10期就被迫停刊了。它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而且是在国民党实施“党外无党”、严格控制舆论的特殊环境下创刊的,不得不采取非公开的隐秘方式发行,这就必然会影响到杂志舆论功能的发挥,但两位主要创刊人李璜和张君勱在当时知识界的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杂志以3000份的发行量广销全国各地,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国民党对刊物的严厉查禁即可作为反证;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对比梁实秋和潘光旦在《新路》和《新月》上发表的文章内容和数量,也可见《新路》对两人产生的影响。此外,沈云龙在其回忆张君勱的文章中也提到,他就是通过

《新路》杂志知道张君勱的,而且称杂志“很有几篇出色的论文”。^③《新路》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部分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第一份刊物,其在思想方面的影响不容低估:

首先,尽管《新路》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没有形成如同《新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所形成的人权运动,但它毕竟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部分知识分子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份刊物,以《新路》为阵地的部分知识分子,在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体制刚刚建立尚未形成完善体系之际,就对它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从而打响了日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第一枪。杂志刊登的政论时评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人权、争法治,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先声。这是杂志最主要也是最突出的贡献。

其次,《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其态度之激烈、内容之广泛在同时期的报刊中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即便是晚一年的《新月》也在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力度上要比它逊色得多。《新路》同人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过人胆识和政治勇气鼓舞了后人,其对宪政、法治、人权等民主思想的追求和讨论为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舆论基础。此后的民主宪政运动,所追求和讨论的基本上是《新路》同人追求和讨论的那些问题。

当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新路》同人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国家唯一合法性代表之地位为前提的,换言之,他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对全国的统治。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要求、现实追求与理想政治的矛盾冲突使得他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呈现出既批判又维护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他们很清楚党和国家、政府不是一回事,因而对国民党主张的“党在

① 君房(张君勱)《新路禁止发行令书后》,《新路》第1卷第4号,第2页。

② 《胡适日记》,1929年7月2日,《胡适全集》第31卷,第415页。

③ 沈云龙《宪法之父——张君勱先生》,见郑大华编《两栖奇才——名人笔下的张君勱,张君勱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45页。

国上”、“以党代政”持的是激烈的批判态度,但在其批判国民党的言论中“党国”的字眼又随处可见,他们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维护国民党政权之立场上考虑问题。如“纯士”就从国民党的利益出发,分析国民党一党专制会引起党内不统一、引起反对党以武力形式来颠覆其政权,压制异己的思想主张,使民意没有正当途径得以表达,这些都威胁党国的存在。^①持有类似意见的还有笔名为“铁豆”的作者。他同样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立场出发,认为“一党专制与维持政权在今天的中国是无关系的”,他认为实力是维持政权的基础,安生乐业是维持政权的保障,只要国民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有政治上意见的可以在正轨上发泄,用不着去阴谋颠覆政府”,这样国民党的政权也就能更加巩固。在张君勱的文章中也处处可见其对国民党现有政治地位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强调《新路》“对现行政治,只有切磋而无攻击”,^②并表明“吾人虽非国民党党员,然其爱国、爱党之诚自信不稍后于忠实之国民党分子”。^③

《新路》同人之所以对国民党专制统治持既批判又维护的态度,分析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甚的环境下,《新路》同人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希望通过国民党来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因此,尽管他们对国民党有诸多尖锐批评,但在他们看来,维护国民党现有政权就如同保存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命一样重要。他们是民主自由的信仰者,但他们同时又是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因此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对国民党既批判又维护的态度是其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的双重诉求所决定的。可以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国

民党政权的这种维护态度,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以中国青年党为例,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青年党就大声疾呼速息内争,以御外侮,主张实行“政党休战”;且不论国民党之反应如何,中国青年党先自行(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行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④再如曾经在《新月》上发表文章强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法治、保障人权的胡适,到1933年也明确指出“国家”是第一位的;“人权”是第二位的,国民党执政是第一位的,“取消党治”是第二位的,国民党是中国的“中心”,其他势力只能暂时从属于它,而不能“离心”即武力反对它。^⑤

第二,《新路》同人都是以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为归趋的,其所主张的“新路”实际上就是英美温和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就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实力来看,将改良希望寄托于国民党也是其必然选择。因为此时正是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并逐步统一全国的时期,这是一个掌握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的执政党,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共产党的势力还只是“星星之火”,在《新路》同人眼中根本不占主要地位,更何况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也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他们根本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蔑称其为“流寇”,为“匪”,他们只是以书生论政的形式,希望国民党能听到其民主的呼声,按照其所设计的方案来改造国家社会。因此,他们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判是以承认国民党对全国统治的合法性为前提的。

总而言之,《新路》同人对国民党“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既是其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的体现,也是其政治价值追求与现实政治冲突的体现,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作出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纯士《为国民党计论一党专政之利害》,《新路》第1卷第2号。

② 君房《新路禁止发行令书后》,《新路》第1卷第4号,第2页。

③ 君房《新路禁止发行令书后》,《新路》第1卷第4号,第6页。

④ 李义彬编《中国青年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90页。

⑤ 胡适《福建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933年12月),第4页。